

基本館藏

39756

列

寧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九五五年 · 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ДОКЛАД 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НА СОБРАНИИ СЕКРЕТАРЕЙ
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ЯЧЕЕК РКП (б) МОСКВЫ И МОСКОВ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9 АПРЕЛЯ 1921 г.

ДОКЛАД 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26 МАЯ 1921 г.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О
ДОКЛАДУ О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ОМ
НАЛОГЕ 27 МАЯ 1921 г.

本書是以解放社版《列寧選集》第十六卷中的《關於糧食稅的演說》、《關於糧食稅的報告》和《關於糧食稅報告的結論》三篇文章的譯文為基礎，根據《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三十二卷原文校訂了一次。

列 寧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1767·787×1092 1/32·1 $\frac{3}{8}$ 印張·26,000字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4)0.12元

目 錄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書記和支部負責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五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俄共〔布〕全俄第十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三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的結論（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在俄共〔布〕全俄第十次代表會議上作）	六
簡要註釋	四

關於糧食稅的報告

(一九二一年四月九日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書記和支部負責代表會議(二)上的報告)

同志們，關於糧食稅和關於改變糧食政策，以及關於蘇維埃政權經濟政策的問題，可以聽到最不同的意見，這些意見產生了許多的誤解。請允許我，在加米涅夫同志同意之下，將我們所討論的題目這樣地分開，即關於盡可能詳細地解釋最近通過的法律一點，由他担任，這樣做比較合適些，因為加米涅夫同志是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最初由我們黨的中央委任，然後得到人民委員會批准，這個委員會在各有關機關代表參加的許多次會議上，曾經制定了最近所頒佈的一切法律。這些法律中最後的一個，是昨天頒佈的，而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在報紙上讀到它了。無庸置疑的，這些法律之中的每一項都引起許多實際的問題，要使各地方黨的與蘇維埃機關的所有工作人員都能充分地熟悉這些法律，並能制定在各地方實際運用它們的正確的實際辦法，是需要我們做不少的工作的。

我想請你們注意一下所有這些措施的一般的或原則的意義。對於這種事實，即蘇維埃政

權與無產階級專政走上承認某種程度的自由貿易的道路，我們應如何加以解釋呢？在何種限度內，可以准許自由貿易和個體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並存呢？如果我們准許自由貿易，則不論如何限制，資本主義的復活都將是不可避免的，那末在何種限度內，可以准許這種資本主義底復活呢？引起這種變化的是什麼東西呢？它的真正的意義、性質和作用是什麼呢？共產黨員必須如何理解這種變化呢？這一點必須如何加以解釋呢？怎樣來觀察它運用於生活中的界限呢？我替我自己所確定的任務大約就是如此。

第一個問題就是：這種變化是由什麼引起的呢？在好些人看來，這種變化似乎真是太急轉直下了，根據太不充足了。

這種變化的基本的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農民經濟空前尖銳化的危機，農民經濟的情況非常困難，這個情況到一九二一年春季，比起所能預見到的要更加困難得多。在另一方面，這種情況的後果，不僅影響到我們運輸業的恢復，而且影響到了我們工業的恢復。我願意指出，當說到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時，當討論到這種改變的意義時，所犯的最大的錯誤，是由於沒有問一問：究竟這種轉變是在什麼地方？這種轉變是從哪裏來的，它將引導到哪裏去？農民經濟在由戰爭所引起的全部破壞之後，因空前嚴重的歉收及與之相關的飼料缺乏（因為青草也歉收）和牲畜倒斃，而更加尖銳；農民經濟的空前嚴重的危機；農民經濟生產力的削弱，在好些地方農民經濟常常命定了完全破產。——這就是一九二一年春天農民經濟

的一幅圖畫。這裏就發生這樣一個問題：農民經濟的這種空前尖銳的危機，與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那種改變餘糧收集制，這其間存在着什麼聯系呢？我以為要了解這種措施的意義，首先必須要問一問自己：在這裏我們是從什麼出發和過渡到什麼去？

如果在一個農民在人口中佔優勢的國度裏發生了工人革命，工廠和鐵路轉移到工人階級手中，那末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經濟關係，其實質應該是什麼呢？顯而易見的，應當是這樣的，即：工人在從今以後屬於他們的工廠中，從事生產為全國所必需的一切生產品，也就是說，生產為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所必需的生產品，並經過自己的鐵路與內河輪船把它運給農民，而從農民方面取得剩餘的農產品。這是十分明顯的，幾乎是無須詳細解釋的。然而當討論糧食稅時，這一點却經常被忘掉了。而這一點是必須記着的，因為為了說明糧食稅（這只是一種過渡的辦法）的意義起見，就必須明確地了解我們要達到何種目的。從我在上面所說過的話裏，可以明白，我們想要而且應當達到的那個目的，就是使農民的生產品，不是以餘糧收集的形式，也不是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工人的國家，而是採取與農民所需要的一切生產品相交換的形式，將農產品交給國家，這些生產品須經過我們的運輸工具運給農民。已經轉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的經濟是可以這樣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如果農民經濟能更往前發展，則我們必須穩固地保證它更進一步的過渡，而這個更進一步的過渡，不可避免地將是把最無利的與最落後的單獨的小農經濟，逐漸地聯合起來，組織成為社會化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

社會主義者一向是這樣設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看的。我重複說，錯誤與誤解的最大來源，就是在於估量糧食稅時，沒有估計到，爲了能够達到我們可能達到與應當達到的目的所必要的這些過渡辦法，其特點究竟何在。

糧食稅是什麼呢？糧食稅是一種措施：我們從這種措施中可以看到某些過去的東西，也可以看到某些將來的東西。賦稅是國家不付任何報酬從居民身上所取得的東西。如果這個賦稅額被確定爲約等於去年所確定的餘糧收集額的一半，則工人國家要維持紅軍的給養，維持全部工業與全部非農業人口，發展生產，發展對外關係（我們需要外國的機器與裝備的幫助）——工人國家單靠賦稅是不行的。在一方面，工人國家想依靠賦稅，規定它約比過去餘糧收集額少一半，而在另一方面，它想依靠工業生產品與某種剩餘的農業生產品相交換。這就是說，賦稅是過去的餘糧收集制的一部分，也是另一種制度的一部分，這種制度乃是唯一正確的制度，這就是經過工人階級的國家糧食機關，經過工人與農民的合作社，實行社會主義大工廠的生產品與農業生產品相交換的制度。

有人要問：爲什麼我們不得不採用這種辦法，其中一部分是屬於過去的，而只有一部分是放在正確的軌道上的呢？而且我們還遠不敢確信，我們能否做到一下子就放在正確的軌道上，並且我們安放在正確軌道上的這一部分，是否是很大的。爲什麼我們被迫採用如此不徹底的辦法呢？爲什麼在我們的糧食政策和經濟政策上，我們要指望這種辦法呢？採用這種辦

法是由於什麼引起的呢？自然，大家都曉得，這種辦法並不是由於蘇維埃政權對於這種或那種政策的某種愛好所引起的。它是由於極端貧困，由於沒有出路的處境所引起的。你們都知道，在俄國工人革命勝利後的幾年中，我們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又必須支持住國內戰爭，現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被捲入帝國主義戰爭中去的所有國度中，即使是因為在它們領土內作戰而遭受到最大損失的那些國度中，到底還沒有一個國度有像俄國這樣遭受損失的，因為我們在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又經受了三年的國內戰爭，從破產、瓦解與生產條件的惡化上來說，國內戰爭是遠甚於對外戰爭的，因為這個戰爭是在國家的中心進行的。這種絕望的破產是一個主要的原因，說明為什麼我們在開始時，在戰爭時期內，尤其是當國內戰爭切斷了如西伯利亞、高加索和整個烏克蘭這些穀物區時，當國內戰爭也同樣切斷了煤炭和石油的供給，並縮小了其他燃料運輸的可能時，為什麼處於被包圍的堡壘中的我們，除了採用餘糧收集制，再沒有其他可以圖存的辦法，就是說徵收了農民僅有的一切餘糧，有時甚至不僅徵集餘糧，就連某些對農民所必需的東西也被徵集來了，只要能够保持軍隊的戰鬥力和防止工業的完全崩潰。在國內戰爭時期，這個任務是極端困難的，如果拿其他政黨對此事的評價來看，則它們都認為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任務。試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即小資產階級的和富農的政黨來說吧。這兩個黨在國內戰爭最緊急的關頭，喊得最響：布爾什維克幹下了狂妄的勾當，當所有的列強都在幫助白衛時，國內戰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事

實上，這個任務確是極端困難的，它要求我們集中全部精力；它所以能勝利地完成，只是由於工人階級與農民在這時所受的犧牲，可以說是超自然的。工人階級從沒有受過像在自己專政的最初數年內所受過的這樣的營養不足和這樣的飢饉。顯然，爲了解決這個任務，除了餘糧徵集，即徵集農民全部的餘糧及其所必需的一部分，是沒有任何其他辦法的。「你們也挨一點餓吧，但是我們大家一起將保衛住我們的事業，趕走鄧尼金和弗蘭格爾」，——任何其他解決，都是無從想像的。

問題不在於從某種經濟制度中進行選擇的可能下採納的一種經濟制度或經濟政策的計劃。不是這樣一回事。當我們還不能保證供給最低限度的糧食和燃料時，那就休想恢復工業。要使工人不完全跑散，只有保存工業的殘餘，並支持軍隊，——這就是我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而要解決這個任務，除了用無報酬的餘糧收集制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辦法；因爲紙幣自然不是報酬。當時我們沒有任何別的出路。這就是我們所從出發的地方；至於我們要過渡到哪裏去，那我已經向你們說過了。如何實現這個過渡呢？像賦稅這種辦法就是爲了實現這種過渡的。如果我們能做到較快地恢復我們的工業，則在豐收的條件下，也許我們是能够較迅速地進到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交換的。

你們中間許多人大概還記得，我們在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怎樣提出了過渡到經濟戰綫上去的問題。當時，全部注意力都會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當時曾估計，我們已擺脫了戰

爭：要知道當時我們對於資產階級的波蘭曾提出了對它空前有利的和平條件。正如你們所知道的，和平是被破壞了，接着來了波蘭戰爭及其繼續——弗蘭格爾及其他等等的戰爭。從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到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這個時期，幾乎全部都是充滿戰爭的時期。你們知道，我們只是在最近才同波蘭人簽訂了一個最後的和平條約，在幾天以前才同土耳其人簽訂了和平協定，只是這個協定才使我們擺脫了高加索的延續不斷的戰爭。只是在現在，我們才同英國簽訂了一個具有全世界意義的商約；只是在現在，英國才不得不同我們建立商業關係；例如美國直到今天還依然拒絕這樣做。從這裏，你們就可以想像到我們是經歷了如何的艱難，才得以從這個戰爭中解脫出來。如果我們當時能夠實現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這個假定，那末自然我們也就能够供給數量大的多的生產品了。

今天，柯洛列夫同志從我們最工業化的、無產階級的、紅色省份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來見我。他引證了好些數目字和事實。在第一年，開工的只有六個工廠，其中沒有一個工廠能不間斷地工作到甚至一個月的。這是工業的全部停頓。在去年內，第一次有二十二個工廠開工了；這些工廠不間斷地工作了幾個月，有幾個工廠工作了半年。計劃任務規定為一億五千萬俄尺；根據最近的數目字，它們生產了一億一千七百萬俄尺；至於燃料，則它們所得的，只達規定的半數。不僅在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範圍內，同樣在全俄羅斯範圍內，就是這樣被破壞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跟農民經濟的破壞，牲畜的倒斃，以及不可能有足夠

數量的木柴運到車站和碼頭有關的。由於這種原因，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人所獲得的木柴、泥炭和煤油，都較少。它們所獲得的燃料只有半數，而竟能從原定計劃一億五千萬俄尺中，完成一億一千七百萬俄尺，這是一個奇蹟。它們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把工人調到最好的工廠裏來；結果，取得了產量的巨大的百分數。這就是一個可以指出我們是處於何種境地中的既親近而又確切的例子。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規定紡織品的全部計劃為六億俄尺以上，但是我們現在就是連三分之一都沒有完成，因為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是最好的，可是就是該省也只完成了一億一千七百萬俄尺。你們可以想像一下，在人口衆多的俄羅斯，却只有一億一千七百萬俄尺的紡織品。這是貧困。工業的恢復竟停滯到這樣大的程度，因此到一九二一年春天，要恢復工業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需要一支龐大的軍隊，而它已經擴大到好幾百萬之衆；由於運輸的破壞，要在冬季很快地把它復員，是極端困難的。我們以空前未有的緊張，才完成了這個工作。

這就是所造成的情勢。除了減低餘糧收集額到最低限度，即徵收二億四千萬普特糧食，以代替原收集額四億二千三百萬普特之外，還有別的什麼出路呢？這是在中等收成條件下必須徵集的最低額，這個數量僅足以勉強餬口。爲了使我們不致局限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給予農民經濟以改善的可能。我們現在就需要拿出辦法來。自然，最好的辦法是恢復大工業。自然，這是最好的、經濟上唯一正確的辦法——加強工廠的生產，提供給農民必需的生產品多

一些，不僅提供工人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紡織品，並且提供農民所極端需要的即使是最簡單的機器、工具。然而，在紡織工業中所會發生的事情，在金屬工業中也曾同樣發生。這就是我們所處的情況。在第九次代表大會之後，未曾做到恢復工業，因為突然碰到了戰爭年頭，燃料供給不夠，運輸工具缺乏，以及農民經濟衰落達於極端。爲了給予農民經濟以最大的幫助，我們可以採取一些什麼辦法呢？除了減低餘糧收集額，改行賦稅之外，是沒有別種辦法的。賦稅數額在中等收成條件下，規定爲二億四千萬普特，在歉收情況下，可能更少些，以便使農民知道，他應當交出在最低限度內所規定的一定的數額，以便使農民能够以最大的熱忱把全部勞動用在生產上，以便農民可以將一切剩餘生產品，用在他所需要的方面，以便使農民經濟有可能不僅依靠工業而加以改善——這將是最正確與最合理的辦法，然而可惜我們在這方面的力量還是不夠的。賦稅額是在最低限度以內規定了，這種賦稅制在各地的實施，可使小工業恢復起來；因爲我們不能在我們所期望的期間內把我們的大工業組織好。這一點已經從按照我們預定計劃而生產了最高數量的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省的計劃上得到證明了。要使燃料儲備充分，足以保證所有工廠的生產，那還須要再等待一年。如果我們能在一年內做到這一點，這就很好，否則也許就要兩年。我們能否給農民保證呢？如果收成好的話，那末這一點是可能的。

當黨的代表大會解決關於糧食稅的問題時，曾分發了我們中央統計局的領導者波波夫同

志所寫的關於俄國穀物生產的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在最近即將以經過補充的形式出版，大家都必須熟悉它。這本小冊子提供了穀物生產的觀念；小冊子上的統計數字，是以我們所作的調查的數字為根據而計算出來的，這次調查提供了全部人口的準確數字，並大約地確定了耕地面積。小冊子指出，在每俄畝收成爲四十普特的情況下，在蘇維埃俄羅斯目前領土內，農民經濟可提供五億普特的餘糧。那時我們便可以完全滿足城市人口的需要——三億五千萬普特——並且還可以有儲備去進行對外貿易和改善農民經濟。但是歉收是如此嚴重，我們平均每俄畝收成不過二十八普特。結果就不夠。如果像統計學家所計算的，以每口需要十八普特計算，則爲了保證半飢餓的軍隊與工業工人的生存，就必須從每口徵集三普特，這必將使每個農民陷於某種程度的營養不足的狀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大限度地減低餘糧收集額和改爲賦稅之外，我們是沒有別的出路的。我們必須用全力和全部關懷去改善小農經濟。應當給予農民從大工廠裏生產出來的紡織品、機器以及其他製造品等等，但是我們不能解決這個任務；然而這個任務是需要立刻解決的，我們必須在小工業幫助之下來解決它。在實施這種新辦法的第一年內，我們應當得到結果。

在目前，爲什麼對農民經濟要予以最大的注意呢？這是因爲只有從那裏，我們才可以獲得我們所必需的糧食和燃料。工人階級，如果它想要像一個統治的階級，像一個實現自己專政的階級那樣來正確地管理經濟，那就必須指出：那裏就是最弱的一環——即農民經濟的危

機；這種危機必須加以補救，以便再度着手恢復大工業，以期就在那個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區，開工的不是二十二個工廠，而是全部七十個工廠。那時大工廠紡織品便可以滿足全體居民的需要了，那時，將不是以賦稅的形式，而是以交換工人階級所給予農民的工業品的形式，取得農民的生產品。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着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需要把貧困與飢餓分担起來，以便用大家少吃一點的代價來挽救出那些如果沒有他們就不能保持殘存的工廠，也不能保持鐵路和軍隊以抵抗白衛的人。

孟什維克竟如此地謾罵我們的餘糧收集制，他們說：蘇維埃政權除了餘糧收集制、貧困和破壞之外，沒有給居民以任何東西，他們說，在恢復局部和平之後，在國內戰爭結束之後，竟不能很快地恢復我們的工業。但是要知道即使是在最富有的國度內，能够恢復工業的時期也需要以幾年計算的。即使像法國這樣富足的國度，也要耗費很多時間以恢復自己的工業，而法國在這次戰爭中所受的損失不像我們那樣，因為那裏遭受破壞的僅僅是全國的一小部分而已。令人驚異的倒是，我們在僅取得局部和平的第一年中，就做到了比如在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所有的七十個工廠中，開工的已有二十二個工廠，並且從預定的一億五千萬俄尺生產額中，竟完成了一億一千七百萬俄尺。餘糧收集制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現在我們却必須變更糧食政策，這就是說，須要從餘糧收集制改為賦稅。毫無疑義地這將改善農民的狀況，毫無疑義地這將使農民能够更準確地、更確定地、更有把握地計算他未來會有的所

有的全部剩餘糧食，他將來至少可以把這些剩餘糧食用來去交換地方上的手工業品。所以蘇維埃政權的這種經濟政策是必要的。

現在，在結論中，我想講講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政策何以是可以容忍的，以及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何以要促進自由貿易的發展？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這種政策好不好呢？要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須要很仔細地分析一下在農民經濟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在開始時，情況是這樣的，就是我們看到了全體農民對地主權力的反抗。貧農與富農都同樣去反對地主，雖然都帶着不同的意圖：富農進行鬥爭的目的，是要從地主那裏取得土地，並在這種土地上發展自己的經濟。那時就暴露了富農與貧農之間不同的利益和企圖。在烏克蘭，這種利益的不同，就是在現在也要比在我們這裏更加明顯地看到。貧農能直接利用這種從地主那裏轉移來的土地，是非常之少的，因為他們沒有為耕種土地所必需的資料和工具。於是我們看到，貧農組織起來，不讓富農奪取從地主那裏取得的土地。蘇維埃政權正在幫助產生着的我們的貧農委員會和烏克蘭的「貧農委員會」⁽²⁾。結果如何呢？結果是在農村裏中農成了佔優勢的成分。我們是從統計上知道這一點的，而任何居住在農村裏的人，可以從自身的觀察中知道這一點。富農與貧農這兩個極端的人數都減少了，大多數居民都接近於中農的地位了。如果我們要提高我們農民經濟的生產率，我們首先就應當考慮到中農。共產黨就是根據這種情況來作出自己的政策的。